

【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DOI: 10.15986/j.1008-7192.2016.06.002

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公报》与剪发运动

袁梓岚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 基于《大公报》对剪发问题的相关报道来反映这种变化。自戊戌年间剪发问题正式提出至民国十多年后剪发的基本实现, 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从起初舆论宣传为主导到渐次实行, 再到民国时期政府推动下的迅速发展。关注国家命运是剪发的重要推动力, 树立新政权的新形象成为民国初期推行剪发的重要因素, 而剪发后的身体必将为国家而投入新的战斗。

关键词: 剪发; 舆论; 国民

中图分类号: K 2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6-0006-06

风俗改良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变革之一, 由于风俗是文明演进的重要成果, 故而有意识地对风俗进行改变将受到多重影响。中国近代的风俗改良始于戒缠足、剪发易服, 它们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 尤其是清朝的辫服国制, 使剪发^①经历了更加曲折、复杂的历程。

辫子以其在清朝的特殊地位, 使剪发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其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从革命史、政治史、文化史的角度, 或者以国家、民族的立场对剪发问题进行了研究^[1-5]。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剪发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及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但都未对清末民初的剪发问题进行完整、系统的研究。《大公报》“报之宗旨, 在开风气, 牖民智, 挹彼欧西学术, 启我同胞聪明”^[6]的办报宗旨, 指引着其对剪发的态度。因此, 《大公报》不仅详实记载了剪发运动中发生的诸多重要事件, 而且还充当了推动剪发运动发展的积极力量, 成为研究剪发运动最可靠的信息来源。本文以《大公报》为主要材料, 试对清末民初的剪发问题进行系统阐释, 期望能够较完整地呈现20世纪初的剪发运动。

一、剪发问题的由来及《大公报》的宣传

辫子是满人的发式, 随着满人在与明朝战争中的不断胜利, 剃发逐渐从满人推广到满人控制的汉

人区域, 从一项临时性的政策变成国策。“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是清初的剃发口号, “一个不剃全家斩, 一家不剃全村斩”的连坐制度更加有力地保障着剃发的推行, “嘉定三屠”^②更是以血的例证向清廷统治下的汉人宣告剃发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死抉择。在清廷强硬政策的压力下, 汉人只得接受辫子, 辫子成为大清的象征。

虽然自古华夷之辨的标准是礼, 谁拥有“礼”谁就是中华。满人入主中原成为“天下共主”, 士人也服从及服务于清廷。那么清廷是否真的成为无可争辩的“中华”? 从朝鲜和日本的一些记录中可以看到, 朝鲜和日本并不认同清廷统治下的中华, 他们认为自己更好地继承了明朝制度, 以“中华”自居, 透露着对清朝的不屑, 发辫是他们攻击汉人最直接的目标物。“‘贵邦之俗, 剃头发, 衣冠异古, 此何得谓周公之礼, 而新制未有之?’……余三光只好以退为进, 勉强应答: ‘仆粗以见识, 自幼出外为商, 其诗书礼乐无识矣, 恕罪恕罪。’”^{[7][61]}这其中也许透露着汉人对自身装饰的不自信, 对剃发留辫非汉人衣冠之制的无法辩驳。

自鸦片战争始, 大清“天朝”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 但“天朝上国”的幻想只能逐步破灭。人们逐步改变着看待外部世界的眼光, 对列强各国的考察、留学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有识之士的认识, 从武器到制度、思想, 中国先进的有识之士对列强各国的认知逐步深入。这种认知在力量的对比下促生着

收稿日期: 2016-09-07

作者简介: 袁梓岚(1992-), 女,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E-mail:lan1347701061@163.com

他们对本国的反思，并引导着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作为清朝独特象征的发辫，无论在国内还是列强各国，都吸引着列强的目光，也逐步引起国人的注意。随着开放度的增加，留学生的增多，发辫的困扰也愈来愈引起注意，对剪发的讨论也时有发生。直至1898年9月，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才将剪发问题正式推向了前台^③。但由于戊戌维新的失败，此折在当时并没有多少实践意义。

康有为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从四个方面讲发辫之害：“（一）发辫不利于大机器生产，‘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二）辫子在战争中有诸多不便，‘执戈跨马，辫尤不便’；（三）发辫给生活带来不便，‘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四）发辫易遭讥讽，‘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8]368-369}说明了剪发的必要性，并且指出欧、美人也是在近几十年才剪发，所以“断发之俗，万国同风”，以此来说明剪发在近世的“大同性”，敦促清廷推进剪发。由于康有为在变法中过于依赖光绪皇帝的权力，所以此折只是试图说服光绪皇帝，而轻视了剪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

20世纪初的剪发运动，由于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是一场根植于民众的运动，剪辫之利以及剪辫将遇到的各种障碍都得到了考虑。1903年《大公报》刊文《剪辫易服说》对各种反对剪发易服的理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将其分为“好大主义”、“好古主义”、“尊祖主义”、“防弊主义”，并以问答的形式对种种反对剪发易服的理由进行了辩驳，冒着为四万万同胞诟骂的风险，向四万万同胞发起挑战，呼唤剪发于当世的紧迫性^[9]。

《大公报》于1906年发出征稿，“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报已数四言之。……尚安望其痛除旧习，力布新猷乎，海内不乏识时务之俊杰，请各抒痛切之论，以唤醒梦梦俾我政府诸公知人心之所趋向，而不忍大拂乎！舆情其即以斯为立宪之先声，可乎！倘世界文豪不吝赐教。”^[10]从征文广告中可以看出《大公报》对于发辫的态度，呼吁阐明剪发的益处以及不剪发的弊端，甚至希冀以此展示民心所向，通过舆论推动政府决策的变动。这也完全符合英敛之时期^④的办报思想，使报纸成为“国民之耳目，社会之回声”，并宣传英敛之等人的改

良思想和主张，推动中国的现代化^{[11]51}。经过《大公报》“审核”呈现给读者的来稿，通过对反对剪发理由的驳斥，既从理论上论证了剪发的可行性，又对辫子的弊端、剪发的益处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针对认为发辫是国粹不可抛弃的“国粹说”，征文中指出土地、利权才是真国粹，真国粹都已经丧失了，何必单单保一发辫。更有运用现代国家理念对其进行反驳，“国体，夫国家者，以土地、人民、主权三者为要素。”^[12]国家的根本是土地、人民和主权，现今都已不保，不去尽力保卫真正的国体，而去保一辫子，实在是舍本求末。对于那些认为剪辫只是形式的变革而无需注重者，征文指出：“凡国家欲文明日益进步，精神与形式不可偏废者也。……故非但精神不能离形式而独立，欲振起精神必先以形式为基础。”^[13]形式不但体现着精神，对精神的塑造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勒纳所说“象征能够支配人”，形式对于人的行动和思想有着重要的支配作用。针对国民程度太低，遽行剪发，恐引起社会动乱的说法，征文认为这是“因噎废食之计，而不通之论也”^[14]。国民程度低，当发展教育，开启民智，促进国人觉醒，不能以国民半未开化为借口而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并且俄国和日本变法都以剪发为第一步，我国应该学习并赶超他们。

剪辫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着急切的现实需求。无论是早期朝鲜、日本对清朝发辫的轻蔑，还是近代欧美人对发辫的戏谑，都在摧毁着国人对发辫的认同感。急于改变中国的面貌，使中国以强大姿态进入世界的愿望，使得辫发的害处更加凸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剪除发辫对于改变中国的形象都是有益的。因而，剪除发辫成为部分有识之士的强烈要求，他们通过分析利弊呼吁民众剪发。

二、清朝统治末期的剪发

清朝的辫服国制使得发辫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留发成为各时期起义人民的重要标志，发辫成为政治立场的标识。但在晚清，留洋欧美的学生规模越来越大，长期的留洋生活，使得部分学生悄悄剪去了发辫。由于辫子的“祖制”地位使得直至1898年康有为上书时期，剪辫依旧是违反国法的行为。但在1900年前后的这几年里，清朝经历了更多更深刻的变化，使得清廷不得不试图对国家施行更大

的变革,这为剪辫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由于《大公报》的有闻必录,对一些传闻也进行了报道,这些经过筛选的传闻传达着《大公报》对事态发展的期望。在日俄战争期间,虽然剪发依旧没有得到清廷的明谕许可,但剪发已不再严格地与政治归附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人士对剪发跃跃欲试。在《大公报》的征稿中,也对如何实行剪发提出了详细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学界、军界作为国家智力、勇武的代表,必须强制实行,其余的人可以自由剪发,不必强制;或者认为政府是国民的代表,政府人员应起到表率作用,首先剪发,其他人便会跟随剪发;或者按社会阶层依次实行,以保障社会稳定。种种设想都考虑到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以及在推行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由于各种设想都建立在清廷推动剪发的基础上,因此对代表国家、代表国家先进力量的群体要求强制实行作为表率,其他群体任其自由,渐次推进剪发易服的实行,以利于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如此完备的设计并没有被清廷采纳,从“剪辫较立宪难”^[15]这一评论可以看到剪辫在当时所遭遇的局面。随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先后逝世,清廷的权力重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为剪发的推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宣统皇帝继位后,载沣成为摄政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大量启用少壮派,并派他们前往各国进行考察。这些考察经历给年轻的贵胄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军事方面的,无法回避的身体装饰也影响着他们。“考查军政大臣涛贝勒曾电奏请剪辫发,闻监国并未置可否,而各枢臣对于此事则均不赞成。”^[16]可见,这些年轻的贵胄们已意识到剪发的必要性,他们试图以自己的中枢地位影响国家的政策。虽然这种想法未能成为事实,但这种报道刺激着那些有心剪发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内切实推行了剪发。

军队的强弱对于国家政权建设极为重要,面对弱肉强食、被各国欺凌的现状,仿行外国军制建立新军成为清政府的要务。从镇压太平军之后对洋枪队的收编,到清末训练新军,清军对西洋军制的模仿更加全面。前文曾提到涛贝勒奏请剪发,但为载沣所驳回,涛贝勒即联合荫尚书等同意剪发者在自己控制最力的禁卫军中实行剪发,对剪发“准其自由不加阻禁”^[17]。在涛贝勒的支持下禁卫军及各省

军队均已剪发,但由于既没有明谕许可,又有奕劻等人的反对,观望不前者仍大有人在。涛贝勒为推进剪发甚至要先行剪发作为各军的表率,但为朗贝勒所阻止^[18],可见涛贝勒对于剪发的决心,也可看到剪发的前途。军界的剪发在出洋考察过的大臣的有力推动下,以及资政院通过剪发易服议案的刺激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学界是统治的中坚力量,对社会有重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作为精英阶层向来受到重视。留学生是剪发的最初实践者,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学堂逐步成为教育的主流,学堂提供了更加聚集、开放的空间,使得学生更易受到外界新思想的影响。由于学界缺少涛贝勒那样有力的支持者,更由于中枢人员的谨慎,学界的剪发经历了不同于军界的发展历程。《大公报》不但积极宣传军界剪发的进展以引导国民,同时再次发文敦促国人剪发^⑤,学界也不甘落后,在12月5日以题为《学生剪发》的报道中,一名英文教习和十一名学生共同剪发^[19],两天后的《八旗学生剪发易服之先声》报导“准飭全堂各生一律将发辫剪去,以免任其自由转致有参差不齐之虑……本监督拟于日内通盘筹划制办新式学服,准于年内将剪发易服两事同时办到以收整齐之效,而为学界之倡导。”^[20]面对学界的踊跃剪发,甚至是有组织的集体剪发,学部缺少荫尚书这样的开明者,他们唯恐局势难以控制,便下令禁止剪发,“爰于初五日通行各省,提学使京师督学局及直隶本部各学堂严禁学生剪发易服,如有仍行擅专者,即将该生照违制例办理”^[21],企图以一纸禁令禁止学界的剪发,但此禁令非但没能禁止学界的剪发,反而激起了学界的反抗情绪,引发了更加集中的剪发行为。从《大公报》的一个调查中我们可见一斑,“兹将最近之调查笔录如左:(一)商业学堂由各生联合团体,于昨日全堂剪剃;(二)八旗高等学堂教员由陵子平君发起,所有谢琪诸君刻已一律剪剃;(三)八旗学堂学生精筱峰、茂珍诸君倡首剪剃,相率剃去者已有数十人,刻仍相继剪剃,莫可遏止;(四)测绘学堂教员、学生于昨一鼓作气全堂剪剃,刻已无一人仍拖长辫发矣。”^[22]由此可知,学部已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学界,学界的剪发已不可阻挡,顺其自然才是清廷明智的选择。面对此种局面,各省督抚自然不能坐视。据《大公报》报道,清廷曾特电向各省督抚咨询对于剪发的意见,滇、

奉、粤、鄂等十二督抚均赞成剪发^[23]。由此可见，不赞成剪发者已陷于孤立局面，学界或单独或集体的自主剪发，督抚对剪发的赞成，使学界的剪发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已非个别人可以改变。

军界和学界的剪发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但高度的组织性、统一性有利于其作为集体共同行动，或作为一个集体受到人们的关注。政界虽然也有此特性，但其所具有的国家与政权的代表意义，使其更加谨慎，各级官员以国家政令作为行动的标准。工商界是一个松散的形式，缺少组织但也更难集体控制。在军学两界剪发迅速发展之时，工商界人士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大多以结伴（同事或亲人）的形式共同剪发，他们遍布银行、铁路、矿厂、洋货铺、教堂等各个行业。他们身体力行，也积极倡导周围的人剪发，一篇《是诚剪发之先导》的报道中，对自身剪发并提倡其他人剪发者“特表而出之”^[24]。随着清末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对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时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凸显。剪发既可省去整理头发、剃头的时间，又有利于商旅的长途跋涉，机器作工，尤其是减少了工厂作工的危险性。“德界德泰铁厂有学徒唐某香山县人，一日在工作偶未留神，被机器绕住发辫，急行拖拽致将左手轧为三截。”^[25]这种时有因发辫而伤人的事件，更使得辫子成为害命之物。军学两界剪发的影响，以及出于自身需求的考虑，使得工商界剪发者迅速增多。工商界由于其对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更由于其分散的特性，使得剪发具有分散性，清廷禁止工商界剪发的禁令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更小。

由于涛贝勒、荫尚书等人的鼎力支持，剪发在军界得到了极大的推行，而学界和工商界虽然没能得到此种有力的推行，但经历了一个自觉剪发的历程，规模及影响力都不容小觑。政府中不时传出的禁止剪发的禁令，阻碍着剪发的实行，使得剪发没能完全实现。清廷在武昌起义后终于下发明谕“资政院奏恳请降旨即行剪发以昭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其自由剪发”^[26]。武昌起义之后，南北对立，政局动荡，形势不明，更何况其中有“自由”二字，大多观望，使得民国初年发辫曳曳者比比皆是。

三、民国初期政府极力推动下的剪发

中华民国建立，专制已除，共和肇立。大清子

民已成共和国国民，当有共和国国民之风采，作为清朝标识的辫子自然留不得。民国初年，政局不稳，称帝、复辟都影响着共和国的建设，但共和最终取得了胜利。恢复共和之后，颁布“剪发令”对新政府是重要的。在政府的一次次命令及政府官员的极力推动下，在民国初年风气所到之处都已实行剪发。

新政权建立新的形象与实行新的制度、纲领同样重要，新的制度、纲领使其在实质上区别于旧的政权，而新的形象则向民众宣告了自身的不同。正如大卫·科泽所说：“在政治斗争中，仪式既被用来宣示对权力的占有，又被用来向公众传递讯息。”^[27]^[120]对新形象的接受，也就意味着对新政权的接受。因此，推行剪发对于民国政权是重要的，既是表达民众对新政权认可的途径，也向各国展示了共和国的形象。无论是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袁世凯、黎元洪，在其上任之初，都颁布了剪发令，敦促国人剪发。当然，民国时期的剪发相当温和，即使有强迫的现象也只是强制剪去发辫。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即颁布了严厉的剪发令，“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28]^[25]在南北和谈、形势未明的情况下颁布剪发令，既是在仪式上向民众宣告共和国的成立，也是向清廷发出挑战，同时也促进了那些倾向于民主的人士的剪发行为。在此期间，清政府内部的官员也相继剪去发辫，徐仁菊带领军咨府剪去发辫^[29]，胡馨吾带领外务部剪去发辫^[30]，官场中也有其他官员相继剪去发辫，南北政府虽出于不同的目的，但都赞成剪发。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于2月26日再次颁布剪发令，“昨袁总统颁布命令于各部首领，飭即督飭全部人员一律剪除发辫以新耳目”^[31]，并下令军学两界一律剪发。这是顺应时势的需要，也宣告着袁世凯对共和的拥护，剪发成为共和国民的共识。即使在袁世凯称帝时期也未曾重新装上辫子，只是张勋复辟时期的辫子军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但是这场闹剧很快就结束了，辫子军也剪去了辫子，“定武军向有辫子军之名，其一种怪形状实中外各国所无。……数营亦于日前由张文生倡率全行剪发”^[32]，官方剪辫自此已彻底完成。共和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虽然政局依旧混乱，但中心问题在于争夺中央政权，对全国的控制权，剪辫也同共和一样深入人心，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剪辫的实行。

新政权的新形象,以及不断颁布的剪发令,激励着民众剪去发辫,国民也以新的、更加有效的方式鼓励未剪发者剪发。“闻杨柳青镇,华鑫理发所刘君得顺,以该镇自粘贴劝导人民剪发告示,……二十七号计算三星期内剪发者不取分文,逾期仍减收丁价。”^[33]不论刘得顺此举是以推动剪发为目的,还是宣传自身的一种方式,对剪发的推行是实实在在的,民国的剪发呈现出新的面貌。普通民众对于新事物大多持观望、跟风的态度,因而在那些较闭塞的乡村中剪发还是有限的。“……该剪发队即赴县公署仪门内,等候完粮之人垂有辫发者揪着立即剪去。”^[34]部分官员为了更有效地推行剪发,采取此种强制手段,虽然容易引起混乱,但效果明显。对于剪发,普通民众如此积极推行,官员如此激进推进,可以预测,发辫不久将会消失。

武昌起义后,清廷希图通过颁布自由剪发令而稳住民心,使得在清廷的控制范围内,剪发成为合法行为。民国成立后,为向民众宣示新政权而颁布剪发令,但政局并没有稳定下来,各北京政府除了张勋复辟时期都支持剪发,而张勋定武军的剪发则宣告了辫子在政坛上最后挣扎的失败。民众的自发剪发与鼓励未剪发者剪发,以及政府的提倡甚至是部分的强制,共同推动着民国时期的剪发,使得风气所到之处剪发都已实行。

四、结 语

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也包括一个文化性的成分^[35]。辫子自满人将其强加给汉人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清廷试图以此来束缚、规训汉人的内心,使汉人能够顺从其统治。在清末,清朝统治面临重重危机,来自外部的压迫,使得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从最直接的武器到最核心的思想、制度,天朝上国的观念受到了彻底的挑战,作为清朝重要标志的辫子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无论是被朝鲜、日本称为“胡”的辫子,还是被列强各国戏弄的辫子,都使国人感到了耻辱。从对西方武器、练兵之法的学习,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辫子的障碍作用日益凸显。日本、俄国变法的启示,使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剪辫对实行变法、改变国家命运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于1898年由康有为在上书中正式向光绪帝提出,但并没能真正推动剪发的实行。至20世纪初,国际、国内

形势更为复杂,舆论界也积极宣传剪发,辫子所具有的政治归属意义逐渐消失,使得剪辫成为可能。宣统年间,一批年轻贵胄的登台给剪发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使得剪发经历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期。武昌起义后,清廷为稳固人心而颁布剪发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树立新政权的形象也颁布剪发令,定武军剪辫使得辫子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与此同时,民间剪辫在民众自身和官方的共同推动下,风气所到之处都已剪发。而如辜鸿铭先生坚持保留辫子者为数极少,他们虽拖着辫子,但也逐步融入民国生活中。

由于20世纪之前各国女子均未剪发,即使女权运动下的剪发也只是一时风靡,很快消失。中国虽有金天翻于1903年在《女界钟》中呼吁剪发,但并没能引领女性的剪发运动,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女性剪发才在国权与女权中占据了更多的地位,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由于20年代中国的复杂形势,以及欧美各国女性剪发运动的刚刚兴起,使得女性剪发在承担着使命的同时亦兼具审美,对审美的追求是女性剪发的一个特色。女性只有在取得社会资格之后,才能承担起国家使命,所以女性剪发主要发生在五四启蒙之后的20年代,却有着相似的使命。

剪发实为近代中国人民身体之重大变革,使身体部分地从旧的政治藩篱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本身就意味着新的使命。辫子带来的不便及耻辱,以及对改变中国现状的渴望,推动着剪发的渐次实行。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展现新政府“合法性”形象的需要给了辫子以最后一击。辫子被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强加给汉人,这种文化意义使得清政府竭力维护发辫,而变革者则企图借助剪发推动国家的改革,使得剪发成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最终使得剪发成为新式政府的表征。

参 考 文 献

- [1] 程为坤. 民初“剪辫热”论述[J]. 社会科学研究, 1987(3): 71-76.
- [2] 陈生玺. 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J]. 渤海学刊, 1995(4): 64-70.
- [3] 樊学庆. 辫服风云: 剪发易服与清末社会变革[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 [4] 闵杰.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5] 谈火生. 辫子: 政治象征与认同[J]. 鄂州大学学报, 2008(7): 12-17.

- [6] 发刊词[N]. 大公报:第1号,1902-06-17(01).
- [7] 葛兆光. 宅兹中国[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8]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9] 剪辫易服说[N]. 大公报:第261号,1903-03-15(01).
- [10] 征文广告[N]. 大公报:第1457号,1906-07-27(01).
- [11] 侯杰. 《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 [12] 剪发易服[N]. 大公报:第1485号,1906-08-24(02).
- [13] 剪发易服议[N]. 大公报:第1495号,1906-09-03(03).
- [14] 剪发易服议[N]. 大公报:第1492号,1906-08-31(03).
- [15] 简评[N]. 大公报:第2668号,1909-12-22(03).
- [16] 枢老之力保发辫[N]. 大公报:第2861号,1910-07-14(02).
- [17] 禁卫军尽许剃发[N]. 大公报:第2920号,1910-09-11(02).
- [18] 朗贝勒对于剪发之慎重[N]. 大公报:第293号,1910-09-22(05).
- [19] 学生剪发[N]. 大公报:第3005号,1910-12-05(05).
- [20] 八旗学生剪发易服之先声[N]. 大公报:第3006号,1910-12-07(02).
- [21] 学部严禁自由剃辫[N]. 大公报:第3008号,1910-12-08(04).
- [22] 学界剪发之热潮[N]. 大公报:第3012号,1910-12-12(04).
- [23] 各督抚之赞成剪发者[N]. 大公报:第3015号,1910-12-15(05).
- [24] 是诚剪发之先导[N]. 大公报:第3003号,1910-12-03(02).
- [25] 辫子要命[N]. 大公报:第3032号,1911-01-02(05).
- [26] 清实录·宣统政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7] 大卫·科泽. 仪式、政治与权力[M]. 王海洲,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 [28] 中国史学会. 辛亥革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9] 徐大臣实行剃发[N]. 大公报:第3374号,1911-12-19(02).
- [30] 外务大臣提倡剪发[N]. 大公报:第3378号,1911-12-23(02).
- [31] 袁总统之剪发令[N]. 大公报:第3433号,1912-02-26(02).
- [32] 辫子军一律剪发[N]. 大公报:第542号,1917-10-22(01).
- [33] 提倡剪发[N]. 大公报:第432号,1914-08-29(02).
- [34] 剪发队又复出现[N]. 大公报:第6127号,1919-10-29(03).
- [35] 黄金麟. 历史 身体 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The Cutting Plaits Movement and Da Gong Bao Newspaper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YUAN Zi-l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twenty years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experienced a historic change, which is mirrored by the relevant reports on plait cutting issues in Da Gong Bao newspaper. It has been a long and twisted cours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air style reform i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ill the prevalence of cutting plaits about 10 year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which the public propaganda took a lead firstly and then put the movement into practice gradually, thus a mushroom growth forc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per argues that an important drive of cutting plaits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t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factor leading to the practice of cutting plait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that the new regime hopes to take on a new look. Those who cut the plaits would join the fight for the state.

Key words: cutting plaits; public opinion; citizen

【编辑 吴晓利】

注释:

- ① 剪发易服虽常作为同一问题出现,但两者之间亦有区别,本文仅对剪发问题进行探讨。
- ② 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纪略》完整地记载了嘉定三屠,并在结尾总结道“远近始剃发,称大清顺民云”。
- ③ 依据目前所见史料,断发与剪发只是两种不同的称法,并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区别。
- ④ 英敛之为《大公报》的创始人,1902年至1916年的《大公报》在其控制下,此一时期的《大公报》被称为旧《大公报》。
- ⑤ 于10月连发《剪除发辫之慨言》、《解决发辫问题》两文。